

□ 李秀潭

多年前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得到一尊刘开渠先生雕塑的铜制鲁迅头像，底座正面刻有毛泽东书“鲁迅”二字，后面铸有“刘开渠”手书体三字。雕像简约洗练，瘦硬通神，生动体现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风骨。刘开渠，我国现代雕塑艺术大师。他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主要设计和制作者。

抗战时代领风气

刘开渠出生在安徽淮北贫穷山村。他的童年灰色暗淡，历经磨难，险些被扔在雪地冻死。但由此也塑造了他倔强、坚韧的性格。他上小学时，在美术老师、后来成为文化大师王子云先生的关怀帮助下，考进北平国立美术学院，从县城走向京城，迈出了学习美术专业的重要一步。1927年，军阀张作霖认为艺专画裸体画“有伤风化”，学校被查封。后来得到主持中华民国南京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工作的蔡元培先生推荐，到法国巴黎这座雕塑之都留学，领略了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罗和法国近代雕塑大师罗丹为代表的两座雕塑艺术高峰的风貌，开始了他一生真正的雕塑家之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巴黎深造6年的刘开渠，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毅然回国，立志用雕塑为武器，激励国民之心，振奋民族精神，抵御日寇侵略。1933年夏，他回到上海，去看望已到中央研究院任职的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也在场。蔡先生高兴地对他**说**：希望你能为中国的雕塑，开一条新路。鲁迅先生也以期许的目光叮嘱他：中国过

塑造民族精英 弘扬正义之魂

——一代大师刘开渠的雕塑人生

去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两位长者的谆谆教诲，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雕塑这种造型艺术，几乎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的第一步是制造工具，第二步就是用泥土、石块、木头以及铜铁等金属塑造形象，用以纪念死者，颂扬活人。但是，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的雕塑，以及我国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和历代寺庙、宫殿、陵墓，大多都取材于神话故事、宗教题材和帝王贵族的事迹，甚至把雕塑品当供养人，当陪葬俑，当墓道前的翁仲。为鬼神菩萨塑像，有社会市场；为人塑像，群众敬而远之。这就是旧社会雕塑家命运的缩影。

雕塑之路，何去何从？刘开渠认识到开辟雕塑新路的艰难。他以自幼在磨难中养成的不畏艰辛、不怕曲折、不计成败的坚定意志，通过雕塑教学，培养人才；通过自己创作，塑造人民形象，改变人们观念。1934年，他为淞沪抗战牺牲的88师英雄做雕塑纪念碑，第一个用双手堆起了这抗日的丰碑，塑造了民族的英魂。1938年，战时大后方物资十分匮乏。他亲自寻找、购买和加工观音土、石膏粉等雕塑材料，找铁匠铺和木器作

坊做塑像骨架，克服种种困难，为抗日将领王铭章做骑马像，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雕塑《无名英雄像》。这“无名”要比有名更具代表性，更具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大众英雄形象的代表。著名画家徐悲鸿看了这座雕像后评价说：“这是伟大的作品。”1945年，刘开渠又为在河南漯河抵抗日军牺牲的李家钰将军做了一座骑马铜像。其间，他还创作了高浮雕《农工之家》，在中国雕塑史上开创了雕塑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群体之先河。抗日的题材，民族的英魂，下层劳动者和保卫者的典型形象，使刘开渠的创作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他实现了回国时的诺言，塑造了东方雄狮的怒吼。他为中国现代雕塑史的开篇，写下重重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初期望丰碑

抗战胜利后，刘开渠为了雕塑事业，回到上海，任园林局管理处技工，负责园林和广场的美术设计。在此期间，他为最崇敬的鲁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做了塑像。

1949年5月6日，上海解放。他不顾危险，和艺术界进步人士一起绘制巨幅毛泽东主席画像，将它挂到国

际饭店24层最突出的位置。1949年6月，刘开渠赴京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美协副主席。不久，他又根据上级指示，接管杭州国立艺专，担任校长兼雕塑系主任，并兼任杭州市副市长。195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兴建一座纪念碑，以缅怀百年来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纪念碑的总体设计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家梁思成和林徽因负责。周恩来总理调刘开渠来京，任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和美术组组长。他建议纪念碑底座用浮雕的形式，这比勒石铭文的教育效果更形象直观。之后，他同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历史中，选择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江8个重大历史事件，做出10块大型浮雕。他除负责整体设计外，还亲自创作了碑身正面的3块主体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以及《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词，是毛泽东主席写在普通老式信纸上的，放大后，每字一人多高，边缘都有飞白和毛刺，刘开渠亲自进行修饰。《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这块浮雕，表现的

虽然是渡江的一瞬，但它的气势、场面、氛围，都是劳苦大众百年来反对侵略、反对压迫的缩影，是民族之魂的形象再现。

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8月1日动工，至1958年5月1日胜利落成。这是刘开渠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品，体现了他一贯的塑造民族精英、弘扬正义之魂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纪念碑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部教科书般的“石书”。

改革开放年代开新路

刘开渠的雕塑人生坎坷曲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风云变幻中，他的大女儿刘微微因帮父亲赶抄检查作品，积劳成疾，患肾炎不治而歿。三女儿刘沙平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厄运，溺水而亡。二女儿刘米娜生于抗战时，由于战乱，接生不力，造成终身残疾。进入古稀之年的刘开渠夫妇，只能与半残的二女儿相依为命。但是，他在磨难中坚强地挺过来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刘开渠犹如饱经风霜的老骥，壮心不已，振奋精神，砥砺前行。他恢复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又担任毛主席纪念馆雕塑小组组长。他还应聘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评

康熙用人史话（下）

□ 陈家兴

体察民情，周知吏治

从历史记载看，康熙获知民情的途径有很多，从“部臣议事”而知一些官吏“惟知推诿卸责，而无任事之实心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推诿塞责，不担当，不作为；有从督抚治事而知“惟以蒙蔽养奸，而无澄清之实政也”，今天意谓欺上瞒下，蒙混过关，而不想真干事；有从言官奏条而知“或借端营私、巧为掩饰，或推诿卸过、冀免处分，或徇庇情面、曲为弥缝”，即谓官官相护、打保护伞；还有从官员往来获知“借名令节生辰，剝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借婚丧嫁娶、生日节日之机收揽钱财。凡此，康熙可谓“门儿清”。

吏治积弊，乃积久而生。如上所列诸事，在任何一個时代都可能存在，其所以清所以浊，全在于居上位者能否察觉到，是否愿意根治之。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实现自净，关键在于治，治则清，不治则浊。

康熙的做法是，严格考核官吏，在30多年里，大批不称职的官吏及时受到处理，有1500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职调用，还有1500多人因“不谨”和“罢软无为”而被革职。因

廉洁能干受表彰的有700多人，因贪酷被惩处的有500多人，因老病而休致的达2600多人。

在用人问题上，康熙信奉“有治人无无法”的规条。他说：“从来有治人，无法治，为政全在得人……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治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这一理念，当是源于实践的经验思维，法治、制度当然极为重要，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制度律法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有了律法制度，更要有执行力、有能治理之人，归根到底，就是用人的问题。

对于委任的一般州县官员、题补武官、被参官员保举人员等，康熙都会亲自提问，“亲验补授”，并给予指示，如果发现庸劣者，便予以罢斥，相反则予以肯定。这样做，未必就真能知人优劣，对于那些善要嘴皮子而不会干实事的人，此举必不管用，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个知人之道，能够发挥一定效用。

康熙还让被任命的督、抚和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他告别。1685年，漕运总督徐旭龄对康熙的信任和重用深表感激，并虔诚地向康熙讨教治漕的方略，康熙叮嘱说：“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更不为好奸。”这说的正是标杆作用，正人先正己，己身正不令而从。无论奖惩，不仅要注重其本身，更要注重其效应。

康熙知人的另一个渠道就是出巡。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目的是“体察民情，周知吏治”。当时发现漕运总督卞甘“莅任以来，并无善状，且多不谨处”。在确知其怠政为实后，给予撤职处分。康熙曾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这表明，康熙也得知人之道，不能依靠舆论或身边人的褒贬，更要问之于民。民众的“极口颂之”与“含糊应之”，在今天看来都极有现实感。当然，难点就在于能否听到百姓的真话。

用一清官而清官毕至

扶植清官，据称是康熙费力最多也最具特色的。他以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固然重要，但贪官危害已成。积极的做法是培养扶植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吏。其实，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体两面，反贪污治贪设的是底线，让官员知耻、知耻；扶植清廉设的是高线，让官员思齐、对标，最终为的是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于成龙廉而能干，一路被擢升至两江总督。1681年，康熙召见当时还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赐坐，赐茶，面谕曰：‘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朕所深知’”，勉励他要“始终一节”。1684年于成龙病故，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轍，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功”，多有加赠哀荣。这算是给清官以高规格的礼遇与任用，康熙的目的

就是试图以此树立榜样，克服贪墨之风。

1687年，康熙对大学士等说道：“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所谓官员清廉者，一为自律而清，一为他律而清，康熙心底很是清楚。因此，他希望通过扶植清官以确立用人导向：“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可令九卿集议。”于成龙前因九卿推荐，朕始擢用。若再有如此好官，不拘大小，亦令九卿保举来奏。”

正所谓用一清官而清官毕至，在康熙的用人导向作用下，清官力量渐强，接连出现了两江总督卞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闽浙总督王瑍等一批清官。他们的出现如一股清风，给清朝官场带来不小的正向影响。

人必先心术，次才学

在用人理念上，康熙在不少方面达到一些雄主的水平，有些方面亦有所创见。

在用人重要性上，康熙认为：“知人难，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关于此。”这个认识还是很到位的。后来，他在读司马光上奏给宋仁宗的札子时感叹，司马光论述治国之道的三条：任官、信赏、必罚，“要言至理”，可以书写下来刊刻于碑，或置之座右，“万世不易也”。这说明他在内心里很是认同这三条治国之道。

比如1673年，在弘德殿，讲官进讲完毕，康熙就对讲官说：“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这个根源找得很对，官员不仅是标杆，更决定百姓福祉。官员搞腐败，民生终必受伤，官员若有甚者直接与民争利，百姓如何能安？

在用人的德才考量上，康熙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687年，康熙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对德与才这个千古命题还是有其见识之深与察微之能的。

在用人导向上，康熙察觉：“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员，则众人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意谓举贤、退不肖两手都要硬。

在用人制度上，康熙亦有其看法：“设官用人，国家大务，除授升迁，宜立画一之规，方可永行无弊。”可以说对用人制度规范寄予了很高期望。因此对吏部所进的《品级考》，指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寄望的正是用制度来管人用人。

选人用人史话



张晓光 / 摄

（上接1版）

不同领域的改革呈现不均衡现象。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进展较快，扩大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创新进展较慢；只涉及单一部门改革或程序优化的“微创新”进展较快，涉及跨部门、制度性改革的任务举措落实较慢。较为突出的是，政策配套和系统集成不到位，关键领域进行实质性制度创新的难度加大，影响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推进步伐和实际成效。

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规定的范围过于模糊，一线工作人员难以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和要求、承担相关职责实现监管到位的难度较大。

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

针对先行先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自贸试验区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指示要求，切实解决改革创新中遇到的制度障碍与实际问题，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

完善落实自贸试验区的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国家层面，应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的要求，赋予自贸试验区在关键领域开展更大力度的试验探索和压力测试的新任务。在部门和地方层面，应本着“勇于创新、大胆尝试”的精神，紧紧围绕我国正在进行的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自贸安排等重大涉外谈判的需要，将市场主体需求强烈的，涉及扩大金融和服务业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以及经贸规则谈判新议题的改革举措，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升改革创新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在制度设计上，应注重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不同改革领域的各项制度创新。建立更高层级的领导与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增强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牵头与协调作用，建立部门协调联动、自贸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制度创新与推进体系。吸收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及地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参与到联席会议的定期会议中，强化相关部委对自贸试验区诉求的及时反馈，提高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协调效率，增强出台政策举措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改革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对能下放到地方和自贸试验区的权力，要尽可能下放，增强地方和自贸试验区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充分发挥地方改革的创新的积

选委员会委员，并主持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教学工作，为周恩来总理和梅兰芳、翦伯赞、李劫人、萧友梅等文化精英造像。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一向视雕塑创作为生命的刘开渠，在年近80高龄之际，又牺牲自己的雕塑创作，将全部身心和精力转向中国城市雕塑建设事业的开拓上来。

城市雕塑，包括建筑雕塑、广场雕塑、园林雕塑、纪念碑雕塑及城市、企业、学校标志雕塑等，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城市形象的代言，提升着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

刘开渠勇于放弃个人创作，积极做一个城市雕塑建设的开拓者。为此，他主持起草一份《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义呈报中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赞同成立“城市雕塑规划组”，任命他为规划组组长。1984年，他主持举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在他亲自带领下，中国城市雕塑事业步入令人欣喜的春天。

刘开渠先生就是一尊雕塑。这座沐浴了20世纪风雨和战火云烟的青铜白石般的雕像，从中国淮北家乡走出，走向京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80年的人生道路，60年的艺术生涯，他雕塑了别人，也雕塑了自己。

人生是一部大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刘开渠先生用自己双手镌刻的人生丰碑，像泥土一样质朴，像石膏一样洁白，像汉白玉一样坚贞，像青铜一样永恒，熠熠生辉，长耸人间。

未已斋札记

校园新貌

中央党校掠燕湖边上的南亭，亭上有启功书写的匾额『平湖秋月』和对联『春水船如天上坐，秋山人在画中行』。